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环球瞭望

美国媒体“双面人”

□ 马 寒

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的“民主之春”运动，与此前“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等不同的是，这次“民主之春”运动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将运动矛头由经济要求转向了政治诉求，即抗议金钱政治和腐败的总统大选；二是直击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抗议它们在运动中的集体失声。美国媒体为何失声？美国的“新闻自由”又体现在哪里？

“民主之春”运动

“民主之春”抗议活动中，抗议组织希望通过抗议方式表达“人民心目中真正的民主”的政治诉求。他们通过网站招募志愿者，短短几天，就先后有120多个组织、社会团体和产业工会参与了行动，超过3500人在抗议组织设立的网站上注册，就连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也在Twitter公开声明支持“民主之春”。但奇怪的是，在如此规模宏大的“大事件”面前，美国媒体罕见地出现了集体失声。以至抗议者不得不打出“CNN在哪里?”标语。

事实上，美国媒体不是没有发声，而是不愿多发声或发错了声。有统计显示，在抗议运动中，美国主流媒体CNN的相关新闻报道仅有30秒、FOX电视新闻网17秒、Microsoft全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12秒，而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对该运动的搜索结果也只有区区200多条。除了缩短报道时间和屏蔽搜索结果外，美国主流媒体还对内容进行了“改造”。它们对“金钱政治”“系统性政治腐败”等运动主题闭口不谈，而只关注“选举权利”。这种偏离主题的选择性报道是美国媒体惯用的手法，冷战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媒体的“两面人”本性在历次国际问题中暴露无遗。如在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泰国的“街头革命”、香港的“占中”等问题上采用面上持续关注，背后蛊惑煽动。

美国媒体一向标榜的“自由卫士”形象是由其在新闻选材、新闻报道中的双重标准塑造出来的。所谓双重标准就是对本国“自由民主”运动采用遮蔽态度，而对他国问题采用所谓的“公正准则”“揭示真相”等进行舆论谴责。“美国之音”前台长霍普金斯曾坦言：“冷战以后，美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刻画的敌人及其理由，统统与美国政府一个腔调。”这句话直白地深刻揭示了美国媒体“双面人”的本质。

美国媒体为何讳莫如深

美国媒体对“民主之春”运动的集体失声，并不表示它们对该运动的漠视，恰恰相反，它们对该运动高度关注但却讳莫如深。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美国媒体时刻将偏狭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华盛顿邮报》编印的《记者手册》中明确规定，报纸和记者在报道国家安全时有双重职责，必须格外谨慎处理敏感信息，编辑们必须严格审查那些有害国家安全的信息。那么，什么是有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分析来看，就是危害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信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民主之春”这个底层民众的政治运动，将反对“金钱政治”“政治腐败”的矛头直接对向了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因而必然是有害国家安全的。对此进行有效的信息过滤也是“情理之中”。

美国媒体与政府尤其是大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媒体与政府、大财团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例如谷歌是2006年在美国中情局种子资金的帮助下成立的。除了来自中情局的资助，谷歌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深层次合作，并为其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是美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旗下拥有CBS、CNN、HBO以及众多的杂志和电影公司，其幕后操盘手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等精英巨头和金融寡头。美国媒体接受财团的资金支持必然为其效劳。



▶ 美国民众举行“民主之春”大游行

美国媒体深谙美国的“政治规矩”。美国媒体不仅对美国政治生态相当熟悉，而且是其直接受益者。2016年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仅投放在电视竞选广告上的花费就达44亿美元之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自称投放竞选广告的资金每周约为200万美元。媒体报道的效度和主题必须符合出资人利益，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媒体不可能报道“民主之春”这类运动以反对自己。

美国虚伪的“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虚伪本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坚持所谓“客观真实”的双向标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媒体动辄以“道德卫士”自居，以“客观真实”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大肆指责他国在人权、民族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丑化他国形象。而对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滥用枪支、政治腐败、商业欺诈等闭口不谈。这种双重标准的“客观真实”既违反了基本的新闻道德，更丧失了基本的新闻原则。以至美国报纸编辑学会前主席米歇尔不无痛心地说：“美国人现在很多时候很难分清新闻报道究竟是虚构还是事实，新闻界正陷入腐败。”其二，坚持所谓“自由民主”的双重准则。美国媒体的“自由民主”从来都是对外的。近年来，无论在埃及的宪政变局，还是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颜色革命”以及泰国的政治危机，都能找到美国媒体活跃的身影。它们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局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成功的典范而大加报道，而对试图维护和平局势的异己力量，则扣上破坏“自由民主”的帽子而大加挞伐。相反，它们对本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油砂行动”“黑人的命也是命”“民主之春”等民主运动却轻描淡写、视作“偶然”。其三，坚持所谓“公正立场”的虚假指向。“公正立场”不过是美国媒体掩人耳目的烟幕弹，无数事实证明美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已经严重偏离应有的公正立场。近年来，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中菲领海主权之争，美国媒体也是坚持一边倒的政策，对中国进行蛮横指责，突显了其霸权本性和虚伪实质。正如有学者指出，论题、议题设置的偏狭，以及难以提供公正立场的新闻报道，日益使美国媒体丧失其感染力。

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 王 鹏

在时下流行的语境中，“修昔底德陷阱”一般指霸权国与崛起国间由于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导致毁灭性的体系战争——他们把美国比附为古希腊时期的霸主斯巴达，而中国则成了崛起的雅典——“雅典实力的增长及其给斯巴达人造成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当然，这一比附在逻辑上的随意性及其对历史事实的背离已经为学者所批判。在此，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它的第二层含义：西方战略传统中强调的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间“宿命”般不可调和的冲突。

西方传统“海洋秩序观”的本质与内核

考察美国政府及学者分析中国战略的文献，不难体察出，在其海洋秩序观与海权战略思想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斯巴达臆想症”（比附对手），亦可称之“雅典情结”（自艾自况）。英美总以民主的海洋国家自居，自认为继承了雅典的衣钵，而对立面自然就是不民主的、穷兵黩武的陆权强国斯巴达；或者是更为野蛮、落后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帝国——波斯；再或者是贪婪、不满于现状、执意以武力破坏秩序的威廉德国；抑或是红色帝国苏联。如今，这一系列隐喻与类比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可供“附体”的猎物——和平发展中的中国。

“斯巴达臆想症”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定是正义的、民主的、海权的国家联合起来，战胜邪恶的、专制的、陆权的国家。在理论上，该谬思得到“民主和平论”的背书。而当“斯巴达镜像”与“中国威胁论”合流时，专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便顺理成章地出笼了。可见，这些谬思正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式干扰着西方决策者对时局、大势做出理性的判断。那么，它有被改良或替代的可能吗？

破除“斯巴达臆想症”之解药

作为“海陆兼备型”大国的中国，其21世纪的崛起本身就为反思、破除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战略传统下有关“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不两立”的思维定势提供了某种可能。刘江永教授在著作《可持续安全论》中所阐发的“海陆和合论”为中国现有的海洋行为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解释，更为未来中国海洋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南。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关键词。一是和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二是互补——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三是开放——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四是和谐——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划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而且，不仅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和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也同样重要。

亚洲地缘经济关系决定了本地区国家间需要实现“海陆和合”。亚洲各国山水相连，既有海洋岛国，又有内陆国家和海陆兼备的国家。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泛亚经济圈。从东西横向来看，时下正如火如荼建设中的“一带一路”工程，从西欧的鹿特丹一路走到中国的连云港，再将日、韩诸港口城市间联通起来。而从南北纵向看，联通昆明与新加坡的中泰高铁与覆盖东南亚所有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穿行于山—海之间，将本地区的陆地与海洋国家联通起来。

“海陆和合”体现着陆海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亚洲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俄罗斯和位于中东、中亚的诸多产油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海陆和合”才能确保海陆能源通道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和挑战的需要。鉴于亚洲陆地国家也同样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波斯湾进口原油，同时利用海运从事国际贸易的现状，海上通道安全已成为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当前“国家安全”的观念已远远超出传统安全的范畴。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陆地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反恐、打击海盗、防止跨国犯罪、生态环境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只有通过跨国合作才能有效防范，打造安全和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那种鼓吹“亚太海洋国家应该联合起来，紧密团结在某个区域外海上霸权的旗帜下共同抵制中国的崛起”的论调在理论逻辑和事实依据上是何等的贫乏。对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仅有为本国政府建言献策的义务，同样也应该对国际社会发声，阐明原理、晓以利害，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合起来，为亚太国家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出应有的贡献。

热点透析

专家视点

英国退欧多大个事？

□ 刘建飞

英国退欧公投，让很多观察家大跌眼镜。也许正是因为公投结果出乎人们预料，英国退欧的影响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媒体把它作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利器”，智库关注其对本国带来的利弊得失。这种高热度，使得英国退欧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多么重大的事件，甚至有人将其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

然而，静心而论，英国退欧算多大个事？恐怕要依据影响对象而论。首先是对英国本身的影响。国家层面，既然多数人赞成脱欧，就表明这些人没有感受到作为欧盟成员的益处。实际上，欧洲怀疑派在英国社会及保守党内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只不过近年来欧盟遇到的危机为他们进一步壮大提供了绝好的机遇。然而，从公投得票情况来看，赞成退欧者只占微弱多数，表明在退欧问题上的共识度并不高，退欧即使是好事，也不是多么大的好事。如果考虑到绝大多数精英都反对退欧，那么退欧的好处又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如果因英国退欧而导致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脱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解体，那么对英国来说就是天大的坏事。对英国的不同人群来说，退欧的影响就不好一概而论了。对那些同欧盟有密切联系的英国人来说，是很大的事，而且是坏事。比如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岗位和相当于国会议员的政治地位。

英国退欧的另一个当事者是欧盟。表面上看，失去英国这个欧洲大国，是欧盟的重大损失，欧盟的经济总量及其他实力，一下子被削掉一大块。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行为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欧盟“怎么来的，就怎么退回去”。但是，如果往深层次看，情况并一定那么糟。英国本来在欧盟中就不是中坚力量，它不仅未加入欧元区和申根条约，而且在对外政策上还经常同欧盟核心圈唱反调。2003年，英国跟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两国不仅坚决反对，而且还跟俄罗斯结成反战同盟，以至于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称有两个欧洲，一个是以法德为核心的“老欧洲”，一个是由英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组成的“新欧洲”。这样一个三心二意的成员退出去未尝不是好事，这有利于欧盟增强向心力并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如果欧盟能够从危机中抓住机遇，对欧盟进行革新，或许会使欧盟浴火重生，虽然小了一些，但却更强。

英国跟欧盟“离婚”，按说是他们自己的事，两厢情愿就好，别国管不着。然而，有一个国家却一直想干预这件事，这就是美国。事前，奥巴马总统公开表态，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这表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对美国事关重大。英美有特殊关系，如果英国留在欧盟，美国可以通过英国来对欧盟施加影响，否则法国和德国会带领欧盟走向何方，美国很难把控。可见，美国是英欧分离的真正输家。

那么，谁是英国退欧的赢家呢？有媒体说，英国退欧的真正赢家是伊斯兰国和普京。对伊斯兰国来说，是赢家很好理解。世界越乱越符合它的利益。英国退欧至少会分散国际社会对它的注意力。普京虽然从未公开表达过对英国退欧的态度，但是从大国博弈的角度分析，英国退欧，有可能给俄罗斯改善同欧盟的关系提供机遇。普京早就有欧洲大陆国家建立一个联盟的设想，抛开了英国，就去掉了一大阻力。

对中国来说，从总体对外战略和世界格局的角度看，中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盟来作为多极格局中的一个成员。英国退欧不合此愿。但是从具体层面来说，英国退欧可能给中国带来许多机遇，特别是经济合作上，“一英一欧”或许更有利于中国。然而，无论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都是半斤八两之别，不是多大的事。当然，只要是事，就应当积极运筹，妥善应对，趋利避害。

如果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来看，英国退欧的影响十分有限。不会造成经济危机或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英国自己因退欧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振动很难形成会影响全球经济的“蝴蝶效应”。甚至对正在发生着的欧洲难民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同冷战结束以来的大事件相比，英国退欧不仅不能同苏联解体同日而语，而且也很难同“9·11”、全球金融危机、西亚北非剧变相提并论。对国际政治来说，它是个不小的事，但也不是多大的事。其实，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英国退欧事件所折射的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政治制度的弊端。何以看似非理性的退欧公投竟然成功了？为何绝大多数精英反对的事情，竟然成为现实？英国怎么啦？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菲律宾虚构了中菲之间关于“九段线”历史性权利争端，仲裁庭在菲律宾的误导下关于“九段线”历史性权利主张的裁决是无效的，不影响中国南海权利主张。

□ 王军敏

7月12日，仲裁庭对中菲南海争端做出裁决：其中，关于中国“九段线”问题，仲裁庭裁决中国根据“九段线”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根据。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菲律宾虚构了中菲之间关于“九段线”历史性权利争端，仲裁庭在菲律宾的误导下关于“九段线”历史性权利主张的裁决是无效的，不影响中国南海权利主张。

关于中国的“九段线”权利主张，菲律宾辩称：除对岛礁及附近海域主张主权外，中国对“九段线”内全部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主张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种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实际上就是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且不是历史性所有权主张，不受第298条管辖权例外的影响，不影响仲裁庭管辖权。应该指出，这是菲律宾对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的歪曲和污蔑，是对仲裁庭的误导。

从中国对“九段线”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实践看，中国并未将线内的全部水域主张为领海或内水、行使国家主权。实际上，1958年《领海声明》在宣布适用直线基线制度及12海里领海宽度的同时，暗含地指出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之间隔有公海。1996年《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点和领海基线，这意味着在“九段线”内，中国将根据《公约》把西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享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样，中国2011年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中也主张南沙群岛享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意味着：中国并未将“九段线”内的全部水域主张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或享有历史性权利。

菲律宾利用“历史性权利”的中文表达法，辩称中国没有主张“历史性所有权”。众所周知，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是指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对某些海域享有的权利。历史性权利包括历史性所有权和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所有权所及的水域被称为“历史性水域”，这些水域是沿海国内水或领海的一部分，“历史性水域”主要包括历史性海湾、邻接海岸的其他沿海水域、群岛间的水域等。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分为历史性通过权和历史性捕鱼权。历史性通过权是指在内水的无害通过权，即各国在沿海国由于适用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并未被认为是内水、但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的水域内享有的无害通过权。历史性捕鱼权是国家根据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在先前为一部分公海海域，现为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群岛水域享有的非专属性捕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外交部发言人以及中国学者仅提“历史性权利”，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主张“历史性所有权”。实际上，我国在“九段线”内的不同海域分别享有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捕鱼权。

我国“九段线”权利主张主要包括：中国对该线以内的岛、礁、沙、滩享有领土主权；中国对那些距离较近、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群岛或列岛间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这些水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是我国的内水，中国有权沿这些水域的外缘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并根据《公约》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当“九段线”内的海域成为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时，中国在上述重叠海域内有权主张历史性捕鱼权或传统捕鱼权利。

在菲律宾的误导下，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中国对‘九段线’内全部海域主张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即历史性权利，不是历史性所有权，且违反国际法”的诉求做出了裁决。然而，这一争端本不存在，是菲律宾虚构的争端。而且，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仲裁庭对涉及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没有管辖权。因此，仲裁庭裁决并不影响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时 评